

全球化與社會政策的未來： 德國「新中間」路線之爭議

* 本文原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三十八期（2000年6月）：pp. 91-132。

** 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指正意見，對本文的修改有莫大的助益，謹此致謝。

本文第二節為國科會研究計畫「全球化與民族國家：後民族國家思維、文化界線與歐洲民族國家間的交互激盪」（NSC 89-2412-H-009-001-）的部份研究成果。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全球化下的社會學想像：國家、經濟與社會」學術研討會（2000.1.15-16；台大社會系、台灣社會學會主辦），原題為：《全球化與民主政治、社會福利的前途：德國政界與知識界之相關討論》，今文已大幅增改。

孫治本**

** 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全球化雖未使民族主義沒落，但民族國家面臨日益強大的各種跨國勢力，其功能則確已式微。而約束資本主義的兩大制度 - 民主政治與社會福利（亦即平衡資本主義與社會正義的兩大前提），至今仍只能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中施行。隨著民族國家在跨國經濟勢力衝擊下功能的式微，民主政治與社會福利的基礎也可能為經濟全球化所動搖。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看來，市場法則原本就應該是社會運作的唯一法則。反對此種「解政治化」趨勢的人士，則試圖一方面透過跨國合作，在全球範圍內重新約束資本主義；一方面透過國內改革，因應不可逆轉的全球化潮流。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亦瞭解面對不可逆轉的全球化，必須變革以為因應。德國對於跨國政治架構的建立頗為支持；但在執政的社民黨內部，則出現較接近新自由主義的「新中間」路線與較接近傳統社會民主觀點的社民黨左翼間的衝突。爭執的主要問題即在於：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社會正義應如何維持？

關鍵詞：全球化、社會正義、社會福利、跨國政治、德國、社會民主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 Policy: Controversies over the German “New Middle”

Abstract

Globalization causes the decline of functions of nation-state—although the declining of state’s function is not equal to the declining of nationalism. The premises of a balance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 justice, democracy and social policy, are still carried out in the frame of nation-state so far. With the declension of the nation-state in relation to transnational economic power, the foundation of democracy politics and social welfare is shaken by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Neo-liberalism-globalism thus claims the law of market should be the only law of social operating. Those who are against this kind of “de-political” trends try to re-regulate capitalism on the global scale through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make the states to response the no returning globalization trends through intra-national reform. Germany has a great interes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s; but within the German socialdemocrats (SPD)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The New Middle”, which is close to neo-liberalism, and the left wing of the SPD, which is close to traditional socialdemocracy. The point of issue: how could the social justice be assured under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globalization, social justice, social welfare, transnational politics, Germany, socialdemocracy

一、前言

觀察全球化的趨勢，有許多切入的面向，而德國人看全球化，主要的著眼點在全球化對德國經濟與社會福利制度的衝擊。許多德國人相信，全球化或者對德國的經濟發展、或者對德國的社會福利造成了負面效應（參閱 Zürn 1998：328）。因此，德國人討論全球化，比較偏重政策層面，亦即對全球化該如何（在政治上做出）回應，是要保經濟成長？還是要保社會福利？或者兩者都不必犧牲？

誠如對自由放任主義提出批判的英國學者 John Gray 指出的，全球化導致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抗（較佳的表達方式：兩種市場經濟模式的對抗 - 本文作者），即〔不受政治規範的〕全球自由市場與歐洲社會市場模式的對抗（Gray 1999：116）。前者亦可稱之為美國模式，後者的主要代表之一即是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Sozialmarktwirtschaft）。

全球化使社會市場模式受到了莫大的壓力。按，社會市場模式兼重社會目標與經濟發展，而社會目標的實踐係透過社會政策。更具體地說，社會政策之任務在「消除社會存在之威脅」（Dichtl / Issing (ed.) 1987：1705），「改善個人或團體之經濟和社會生活條件」（Fuchs u.a. (ed.) 1978：713）。社會政策的推動要透過政治手段，然而經濟全球化使資本主義脫離了國界的束縛，導致民族國家的式微，最終使政治必須屈服於資本主義。於是，為了追求所謂的「全球競爭力」，似乎不得不犧牲社會政策。而欲使政治重新獲得生機，恢復其推動社會政策的能力，唯有透過「跨國政治」的建立。這些將在第二節中探討。

全球化使歐洲左派政黨也颯起了自由主義風。英國出現了「第三條路」，社會民主黨（SPD）籍的德國現任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則提出所謂的「新中間」（Die Neue Mitte）路線，企圖調合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思想。然而「新中間」路線不為大多數社民黨菁英所認同，尤其左翼大將拉豐坦（Oskar Lafontaine）任社民黨主席時，兩條路線爆發了激烈衝突。此場政治理念之爭波瀾壯觀，其核

心問題是：「全球化時代的社會正義應如何維持？」故有關德國「新中間」路線之爭議與發展，實可供吾人思考：「全球化時代社會政策究竟該何去何從？」這場路線之爭將在第三節中敘述。

二、（民主）政治的困境與出路

（一）全球化對（民主）政治的威脅

全球化的核心問題是民族國家的式微（孫治本 2000：149-152）。法國大革命後，民族國家躍升於世界舞台。然而值此全球地方化（參閱 Robertson 1998）時代，各種跨國社會空間以及地方（社區）的再興起使民族國家逐漸沒落。跨國的以及地方的力量，不僅削弱了國家，也使認同複雜化。¹民族國家越來越難在種族的純粹性上，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固守其疆界。²民族國家的式微引起的問題是：現代的民主制度、社會福利制度都是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運作，換句話說，尚未有跨國的民主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然而，經濟、文化事件，甚至於對生態的破壞，都已跨國地進行，民族國家對這些跨國事件，不但無能規範，甚至必須承擔其負面後果（例如日益增加的失業與貧窮）。而在尚未有跨國的民主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的情形下，民族國家的式微就是民主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瓦解的前兆。對於民族國家的式微，德國知識界與政界已有充分的認知。³

¹ 然而民族國家的功能衰退並不等於民族主義的終結（冷戰後民族主義甚至越來越興旺）。跨國社會空間（其形成的主要力量之一是人口的全球流動）瓦解了民族與國家疆域的固定聯繫，然而此種「解空間化」作用並未瓦解民族主義，反而造成了跨國民族社會的形成，並使國家內部的民族衝突頻繁化（孫治本 2000：156-160）。此外，民族國家的架構式微但並未消失，以民族國家為互動主體的國際架構亦依然存在，但是當上述新興力量躍升於世界舞台後，「多中心世界政治」（Polyzentrische Weltpolitik）出現了，民族國家必須與各種跨國力量競爭或合作。「多中心世界政治」的論點係 James Rosenau（1990）所提出，這裡主要參考貝克的詮釋（Beck 1999：49-51）。

² 這是晚近全球化現象與「世界體系」概念的主要區別，因為在世界體系理論的分析架構中，民族國家仍是基本的單位（Wallerstein 1984 & 1986；孫治本 2000：151）。

³ 可參閱德國社會學者 Beck 1999：2-10 & 144 及 Habermas 1998；前任社民黨主席兼財政部長 Oskar Lafontaine 及其夫人 Christa Müller 1998：36-40；現任外交部長 Fischer 1998：53-96。英國學者 Martin Albrow 關於此一問題的重要著作《告別民族國家》（*Abschied vom Nationalstaat*, Frankfurt/M.：1998），亦在貝克的主持下翻成德文。

威脅民族國家的跨國力量，絕不僅是由經濟力量所構成。事實上，各種跨國社會空間已經形成，使「社會」的範圍與「國家」的範圍不再重疊⁴。筆者將跨國社會空間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功能性的跨國社會空間」，例如跨國集團所型塑的跨國商業社會；第二類是「生活風格的跨國社會空間」，亦即在全球範圍，人們因著相同的風格或嗜好，彼此聯繫而形成的跨國社會空間，特別是網路的普及，加速了此類社會空間的發展；第三類跨國社會空間則是「跨國民族社會空間」，其基礎是民族認同，但從空間定位而言，跨國民族社會空間瓦解了民族主義與國家疆域間的固定聯繫（孫治本 2000：156-160）。

雖然跨國社會空間可分為以上三類，然而對民主政治和社會福利而言，還是功能性的跨國社會空間的要角 - 跨國集團對兩者的威脅最大。英國 Leeds 大學教授 Zygmunt Bauman 及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均注意到，跨國集團的日益壯大，使民族國家的相對實力不斷下降；然而跨國集團仍欲保留國家架構，只不過必須是弱小的國家架構（Bauman 1998; Beck 1999：131）。⁵

日趨弱小的民族國家無力束縛全球資本主義，根本上造成了「解政治化現象」，亦即政治的效能降低，甚至有可能瓦解，市場法則逐漸凌駕一切。

（二）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政治復興：跨國（民主）政治

⁴ 在全球化以前的現代（傳統的現代；或如貝克所稱的「第一次現代」（Beck 1999：12；第一次現代之後則是「第二次現代」），社會常被認為為某一民族國家的社會（日本社會、德國社會）。貝克稱此為：「領土國家成了社會的貨櫃。」（Beck 1999：90）

⁵ Bauman：「全球資財、貿易及資訊工業的流動性，及其無限制追求其目標的自由，有賴政治的區隔化和世界舞台的分割。我們可以這麼說，『弱小的國家』是有助於他們（跨國經濟勢力）的，... 如果一個國家希望被認為適合獲得世界銀行和貨幣基金會的財力支援，其必須無條件接受的前提是：把門戶打得更開，並且放棄任何一種自主的經濟政策的想法。弱小的國家正是世界新秩序（太常被誤解為世界無秩序）自我維持和再造所需的。」（Bauman 1998：322）經濟全球化使全球資本主義的執行者（最主要的是跨國企業集團），能在全球範圍內操作，然而「國與國間的區別」不但不是全球資本主義的障礙，反而是其所需。資本主義的執行者固然要求建立對其有利的、全球統一的經濟基礎架構，但這不過是指普遍的經濟自由化。然而，必須有國與國間在經、社條件及社會福利、環保制度上的差別，以全球作為資本主義執行者的操作範圍，才有意義。正是因為國與國間存在著制度與客觀條件上的差異，富可敵國的跨國集團才得以從中挑選最有利的生產、管理、納稅所在地，並挾其經濟實力，周旋於各國之間，要求改善投資環境（孫治本 2000：161-162）。

面對經濟全球化造成的「政治失靈」問題，當然有人主張以各種保護主義來維持民族國家的架構。布萊梅(Bremen)大學教授 Michael Zürn 將針對全球化的保護主義區分為極右派的、保守派的、社會民主的及環保主義(綠黨)的四種(Zürn 1998)，顯示各種意識形態的支持者都注意到全球化引起的「解政治化」問題。然而，全球化的不可逆轉性已逐漸為德國各界所接受。面對這種全球化的不可逆轉性，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主張普遍性地接受市場法則(此種主張可參閱 Bryan & Farrell 1997)，亦即正面地評估「無政治世界」出現的可能。然而誠如貝克所指出的，全球資本主義根本不是一種自動機制，而是跨國經濟勢力推動的一項「政治計劃」(Beck 1999：160-161)。

前面已經說過，跨國經濟勢力喜愛民族國家的弱小化，而(真正有效的)跨國甚至普世的政治機制，是對跨國集團不利的，因為普世性的政治合作機制，有能力重新束縛以全球為運作範圍的資本主義。有效的普世性政治合作機制當然尚未建立起來⁶，但區域性的政治合作，已有歐盟作為最佳榜樣。在歐盟經濟區內，跨國企業將越來越難對歐盟成員國施行各個擊破的策略，因為有越來越多的聲音要求在歐盟範圍內建立起跨國民主機制(參閱 Beck 1999：205-210; Goodman 1998; Helmut Schmidt(德國前總理) 1998：51-51; Stüwe 1999：30)，並縮小成員國在稅制、社會福利、環保標準上的差異。例如德國與法國領導人便曾要求整合的歐洲必須是一個真正的社會歐洲，且曾呼籲在七國高峰會上討論全球化的社會後果(*Spiegel Online* 1998.12.01)。⁷

⁶ 針對東亞金融危機，知名投資人 George Soros 呼籲建立適當的國際金融監督及管理機構，並主張民主國家應彼此合作，建立全球性的開放社會，才能因應經濟全球化引起的問題(Soros 1998：175-193 & 213-239)。

⁷ 1992年二月七日在荷蘭馬斯垂克(Maastricht)簽訂，並經1997年六月十六至十七日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的歐盟理事會(Europäischer Rat)補充之「歐洲聯盟條約」(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強化了歐盟制定對成員國俱約束力的社會政策的能力。條約簽訂後與從前的主要區別是：與社會政策相關之部長級理事會(Ministerrat)，其政策決定不再需要一致決，只要多數決即可。但英國被許可不受此一規定之束縛，且英國不參與有關社會政策之表決(Gasteyger 1997: 472)。按，一致決係保障個別成員國國家主權的方式，改為多數決，則成員國在本身反對的情況

面對全球化的經濟勢力，(民主)政治的存續，有賴從民族國家的民主轉型為「跨國民主」(參閱 Beck 1998 & 1999: 127-130; Scharpf (科隆 Max-Planck 社會研究所所長) 1998。) 德國社會對建立跨國政治機制(至少是在歐盟範圍內)的興趣比其他國家大，這又有三種思想上或現實上的根源。其一是認為全球化已使「後民族國家」的時代來臨，這可以貝克的「第二次現代」(見註釋 4) 概念作為代表。而針對全球化及民族國家的式微，貝克提出「跨國國家模式」(Transnationalstaaten; 複數) 以為因應。此一模式一方面肯定全球化的不可逆轉性，一方面欲用跨國政治力量轉變全球化的無秩序狀態。貝克的主張，不是要放棄國家架構，而是要予以轉型，其目的並非為了維護傳統上所謂的國家主權，而是因為全球化引起的問題，只有國與國合作才能規範和解決(Beck 1999: 144-145)。所以，簡單地說，跨國國家模式即是一種國家間的合作模式，然而這與傳統的國際合作模式有何不同呢？這便牽涉到貝克對國家的看法。

貝克心目中的跨國國家有別於民族國家、領土國家，亦即貝克不再認同傳統的民族國家概念，然而跨國國家模式還是肯定國家概念(Beck 1999: 145-146)。依筆者的詮釋，貝克的意思是：國家只需作為一種功能架構，而不必再俱有民族意涵。這是因為在全球地方化的時代，認同問題已複雜化、多元化；認同尤其不再受限於國家疆域。跨國國家即是由多個作為一種功能架構的國家組成。⁸

貝克並且認為，歐盟俱有成為跨國國家的潛力(Beck 1999: 207-208)。事實上，在對歐盟體制現狀及未來的探討上，早已有「超

下，亦須服從部長理事會的決議，則歐盟的社會政策又向「跨國內政」的方向邁了一大步。

歐盟將成員國間的經濟與社會諧和(即縮小成員國在經社水平上的差距)及互助合作視為其主要目標之一。歐洲聯盟條約 130a 規定：「為了促進其內部之均衡發展，聯盟應發展和追求強化其經濟與社會諧和之行動。聯盟特別應追求減少不同區域間發展程度之差異，以及最弱勢區域(包括農村區域)之退步。」(Harryvan/van der Harst (ed.) 1997: 280)。除了原有之區域財政均衡基金外，歐洲聯盟條約又規定了「諧和基金」的設立，以提供最窮的成員國改善基礎結構及環保(Gasteyger 1997: 473)。

⁸ 以筆者之見，貝克過於忽視「認同」在全球化時代中政治運作的作用。即以「跨國國家」而論，其牽涉的不止是貝克言及的「主權分享」，還涉及「認同分享」，亦即「跨國國家」形成的前提是：成員國必須有共同的認同。歐盟的基礎便不只是成員國對歐盟架構的功能性需要，成員國對「歐羅芭」(Europa) 的共同認同，亦是歐盟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

國家」(Supranation) 概念(參閱張亞中 1998)。不過,「超國家」一詞易使人以為現有的歐盟成員國要消溶在此一超國家中,故筆者認為「跨國國家」一詞較佳。筆者簡單形容跨國國家的主要性質如下:成員國必須將一部份的主權讓渡給由成員國組成的跨國政治架構,但成員國仍不失為一主權單位。貝克則以跨國國家成員國間的「主權分享」來形容此種性質,並認為此種可分享的主權是所謂的「包含式主權」(inklusive Souveränität)(民族國家的主權則是排外式的)。貝克認為,由於跨國合作產生了「剩餘主權」,亦即使合作的國家獲得了更多的政治行動可能性,因此,將主權與他國分享,不應視為是放棄主權,而是一種「雙贏」(Beck 1999: 149-150; 177-180),由是,他以「跨國內政」(transnationale Innenpolitik) 的概念取代國際關係的概念(Beck 1999: 145)。

歐盟的實際運作在某種程度上確已俱備了跨國內政的性質(參閱註釋 7、10), 歐盟架構就某些層面而言是與任何從前的國家聯盟都不同的(Hans-Peter Schwarz 1994: 107-108)⁹, 但對歐盟的體制, 仍有「超國家主義」與「政府間主義」之爭(參閱張亞中 1998)。貝克並未觸及具體的制度層面, 不過, 超國家主義似乎接近貝克的跨國國家模式, 而德國是歐盟成員國中最支持超國家主義的, 這又與德國的歷史經驗有關, 此即德國對跨國政治架構的建立興趣較大的第二個原因: 德國對其民族 - 國家主義的負面經驗。

二次大戰之後, 一方面為了防止兩次大戰的歷史重演, 一方面為了德國本身的安全, 德國以歐洲整合和「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us) 為其安全政策的主要指導原則(Voigt 1996: 107)。德國認為, 歐洲整合是防止歐洲出現新霸權, 尤其是防止德國成為霸權(或者說防止其他國家形成此種疑慮)的最佳策略(Peter Schmidt 1996: 213 & 219; 孫治本 1999: 89)。是故, 在歐盟進一步整合的具體策略上,

⁹ 德國關於「歐盟作為一種對於全球化的回應」或歐盟朝向聯邦國家(與「超國家」含義相近)的討論非常多, 前者可參閱佛萊堡(Freiburg)大學社會學者 Hermann Schwengel (1999) 關於歐盟作為第一個「全球國家聯盟」(Union globaler Staaten) 的主張; 後者可參閱 Stüwe 1999。

德國支持「超國家主義」(Supranationalismus)，在具體制度上，主張歐盟必須進行下列變革：各成員國將更多的執行權交予歐盟執委會；歐洲議會在歐盟決策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歐盟各部長諮議會的決策方式由一致決改為多數決(Masala 1997: 228)。換言之，歐盟成員國應該將一部份主權讓渡於歐盟。至於(英國特別支持的)政府間主義，則堅持歐盟應該是一個民族國家合作的架構(孫治本 1999: 89-90)。¹⁰

德國對跨國政治架構特別感興趣的第三個原因是，德國的工資、稅率、社會福利標準，均較許多歐盟國家為高。由於歐盟的市場已一體化，上述差異將導致資本從德國流向其他歐盟國家。是故德國傾向主張統一歐盟內的稅率甚至社會福利標準。在第三節中，我們會提到德國政治領導人這方面的政見。

三、社民黨左翼與「新中間」(Die Neue Mitte)路線之爭

(一)「新中間」與「第三條路」

「新中間」是屬社會民主黨(SPD)的現任德國總理施洛德於 1998 大選年提出的政治口號。其後社民黨贏得大選，一時之間，改革左派

¹⁰ 如同 Klaus Stüwe 所言，如果歐盟要成為一個民主、法治的聯邦國家，必須有三項條件：「其一為以民主方式合法化的、俱主權的國家機構；其二為最低限度的社會 - 文化同質性；其三為共同的溝通。」Stüwe 認為，目前此三項條件並不存在 (Stüwe 1999: 29)。

的確，歐盟並非聯邦國家，但已俱有「跨國國家」的某些性質。所謂的跨國國家，其不同於傳統國家聯盟的特點在於：國家必須將一部份主權讓渡給跨國政治架構。歐盟的實際運作在某種程度上已有「跨國內政」的性質，以下舉兩個例子說明歐盟的跨國國家性質：

其一為歐洲聯盟條約關於「聯盟國民身份」(Unionsbürgerschaft)的規定。歐洲聯盟條約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聯盟國民身份依據本條約實施。聯盟國民為擁有某一成員國國籍者。」同條第二項規定：「聯盟國民有本條約規定之權利與義務。」(Gasteyger 1997: 479)。一般國際組織則只以國家為成員，無所謂個別國民為國際組織成員的概念。

歐盟的財政制度也顯示其跨國國家的性質。一般國際組織之經費來源主要是成員國繳納之會費或捐款，歐盟則有所謂的「自有財源」。當然，歐盟的經費仍來自各成員國，但各成員國有義務支付規定之經費，且此一對歐盟之支付無需逐年經各成員國之國會通過，因此，歐盟不會發生如聯合國會員國積欠會費之事。對於歐盟年度預算之制定，歐洲議會有參與權，對於預算之一部份歐洲議會甚至擁有最後決定權。不過，歐盟經費的多寡仍由成員國決定，只是一旦決定下來，成員國便有義務繳交規定之數額 (Wagner 1999: 32-33)。

似乎成為西方社會跨世紀的主要政治路線。按，美國總統柯林頓早已喊出「新民主黨人」(New Democrats)口號；1997年，布萊爾領導的工黨以「第三條路」贏得了英國大選；而德國社民黨贏得1998年的大選後，歐盟15國中有13國的政府有中間偏左的政黨參與，而四個最大的歐盟國家 - 德國、法國、義大利及英國，總理皆屬中間偏左的政黨。英國首相布萊爾的謀士Mandelson於是認為，改革左派應建立起共同的價值觀及策略網絡 (Perger 1999a)。事實上，中間偏左的國家領導人的串聯早已開始。1998年初，柯林頓與布萊爾即決定共同提出一種介於新自由主義和福利國社會主義之間的新政策，並以「第三條路」名之。兩人且歡迎其他有改革意願的政府領導人加入「第三條路」的討論，因此而有1998年十月首次在紐約大學舉行的「改革高峰會」(Reformgipfel) (Perger 1998)。1999年11月20日，改革高峰會再度於義大利佛羅倫斯舉行，參加者包括柯林頓、布萊爾、施洛德、法國總理Jospin、義大利總理 d'Alema 及巴西總統 Cardoso (Perger 1999d)。¹¹2000年六月三日，第三次高峰會以「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統治」為名在柏林舉行，共有十四國領袖參加 (Spiegel Online 2000.06.3)。

面對全球化，德國社民黨曉得無法迴避，必須拿出具體的政策對應。然而德國究竟應對全球化做出甚麼樣的回應，尤其社會福利制度應有甚麼樣的轉變，社民黨內部的意見分歧。與英國首相布萊爾的「第三條路」一樣，施洛德的「新中間」實際上較傾向新自由主義（但施洛德的「新中間」與布萊爾的「第三條路」仍有區別，參閱註釋11），因此遭到以黨主席拉豐坦 (Oskar Lafontaine) 為首的社民黨左翼的反對。1999年三月十一日，拉豐坦已辭去所有政治職務。但他於1999

¹¹ 在這幾位改革左派政治領導人間，當然也存在著差異。例如施洛德與布萊爾的一項區別是，施洛德較注重對全球金融市場做更多的規範 (Perger 1999d) 而法國社會主義黨 (PS) 在總理喬斯潘 (Lionel Jospin) 的領導下，則仍維持相對較左的路線。在布萊爾 - 施洛德宣言發表後 (詳下文)，法國社會主義黨即草擬一份文件，準備在1999年十一月八至六日在巴黎舉行的社會主義國際大會中提出。相對於布萊爾 - 施洛德宣言，這份文件強調對經濟政策做更多的控制與規範，而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亦應由政府來執行 (Hénard 1999；參閱Perger 1999c)。關於喬斯潘、施洛德、布萊爾三人之比較，另可參閱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2th 2000*。

年十月十三日，出版《心在左邊跳》(*Das Herz schlägt links*, München) 一書，詳述其在黨主席兼財政部長任內與「新中間」對抗的經過，增加了我們深入瞭解此一路線之爭的機會，並從中思考「全球化時代的社會正義」應如何建立的問題。

一般的說法是，第三條路的理論導師是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然而事實上，第三條路可能是個新名詞，但絕非一種新現象；而不論是布萊爾的第三條路政策、吉登斯的第三條路理論或施洛德的「新中間」政策，其究竟有無明確的內涵和新意，都是頗值得爭議的。事實上，早已有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各種修正主義，而自由主義的修正主義向左修，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向右修，經常均可以第三條路或中間路線名之。反對施洛德版的「新中間」的拉豐坦便認為，社會民主黨早在 Godesberg 黨大會對社會主義做出修正後，就已開闢出第三條路了 (Perger 1999a)。按，1959 年十一月，德國社民黨在 Godesberg 的黨大會通過了《Godesberg 綱領》(*Godesberger Grundsatzprogramm*)，此份綱領的基礎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在自由、正義與團結中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並認為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根源是「基督教倫理、人道主義及古典哲學」(Wende (ed.) 1981: 122-123)。

法國社會學家 Touraine 嘗試對中間路線做出如下的定義：只要是嘗試將社會目標與經濟利益結合起來的政策，便是中間路線。Touraine 又將中間路線細分為中間偏右與中間偏左兩種路線。中間偏右路線是經濟勢力與國家的結盟，亦即布萊爾所說的第三條路或社會自由主義。中間偏右路線其實是把重心放在自由主義，但亦注重教育、健康政策及強化社會團體的角色。中間偏左路線則介於布萊爾 - 施洛德路線與傳統社會民主路線之間 (Touraine 1998)。照 Touraine 的定義，則施洛德應屬中間偏右，拉豐坦應屬中間偏左。確實，兩者均屬中間路線，均是第三條路，只是在中間地帶又有偏左、偏右的區別。然而，由於真正傳統的社會民主路線已不多見 (Touraine 沒說清楚他所謂的傳統社會民主路線是傳統到甚麼地步)，以今日德國的意識形態光譜而言，將施洛德路線稱為「改革左派」，拉豐坦路線稱為「社會民主

黨左翼」較為恰當。

Thomas Meyer (1999) 則將第三條路區分為溫和與激進兩種立場。這裡所謂溫和與激進，是指其偏離傳統社會民主觀念的程度，溫和立場者，偏離的程度低，激進立場者，偏離的程度高。在各主要觀念與政策上，溫和立場與激進立場的差異如下：

表一：第三條路的溫和與激進立場

觀念	溫和立場	激進立場
基本價值	正義	機會均等
(社會)政策文化	彈性 + 基本(社會)保障	企業家精神
經濟全球化	以政治型塑〔經濟全球化〕	接受〔經濟全球化〕
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調控， 〔兼重〕供給和需求層面	〔強調〕供給層面
政府與企業關係	領導者 + 經紀人	夥伴
政府與社會關係	強調政府的責任	強調社會的義務
社群主義	補充政策 ¹²	道德勸說 ¹³
福利國家	基本(社會)保障(公民權)再造	強化國家的適任性
現代化	多面向概念 (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	經濟合理化
生態	實質經濟角色	概念模糊
政黨角色	對於社會論爭及合法化俱關鍵重要性	國家第一，邊緣化政黨
策略	結構轉變， 深思熟慮的論爭	文化活動， 受媒體主導的溝通 ¹⁴

¹² 補充政策原是中間偏右路線的社會政策基本原則，詳三 - (三)。

¹³ 意指社會成員的彼此扶持(社群主義)，不應以制度強迫，而只應作為一種道德信念，由人自由遵行。

¹⁴ 意指注重政治訴求的包裝及輿論的反應。

Meyer 1999.

據 Meyer 的看法，美國的柯林頓路線（所謂的「新民主黨人」（New Democrats））屬於激進立場的第三條路；歐陸的社會民主黨則屬於溫和的「第三條路」；英國的布萊爾路線則介於兩者之間（Meyer 1999）。針對本文討論的德國社民黨內部的路線之爭，則可以說：德國社民黨左翼（以前黨主席兼財政部長 Lanfontaine 為代表）屬於溫和的「第三條路」，而法國社會主義黨（PS）在總理喬斯潘（Lionel Jospin）的領導下，亦仍維持相對較左的路線（Hénard 1999；參閱 Perger 1999c）；德國總理施洛德的「新中間」則介於溫和的「第三條路」及接近激進立場的英國布萊爾路線之間（參閱 Meyer 1999）。

第三條路或「新中間」到底是甚麼，不是看理論上的定義或宣傳口號，而是看具體的政策。第三條路早已存在；早已有各種各樣的第三條路。不過，最近喊響的第三條路，若要說其與從前的各種修正主義有甚麼區別，那可能便是：晚近（各種）第三條路的出發點是接受經濟全球化的事實（Meyer 1999）。然而，接受此一事實後，還要問的是：在不可逆轉的全球化浪潮中，社會正義如何維持？「全球化與正義」因此是各種第三條路的主要爭議點。以下我們詳述社民黨 - 綠黨執政後，左翼的拉豐坦路線與「新中間」路線之爭。

（二）「拉豐坦（Lafontaine）路線」與「新中間」衝突記要

1980 年代是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及美國總統雷根的新保守主義高唱雲霄的時代。進入 90 年代，保守政黨逐漸在各國大選中失利，然而有趣的是，取得執政權的美國民主黨、英國工黨以及歐陸的社會民主黨，卻日益向新自由主義靠攏，其（據稱的）原因是：全球化。

1998 年的德國大選，施洛德提出「正義與創新」口號（Perger 1999e），這是表示，社民黨仍注重社會正義的維持，但要以新的方式，

亦即其「由左轉右」的「新中間」路線。然而，當拉豐坦（Oskar Lafontaine）仍任社民黨主席時，施洛德尚無法自由地施展其新中間路線。

1998 年大選前，拉豐坦以黨主席的身份，基本上決定了社民黨公佈的施政計劃內容。施政計劃中說：「我們對經濟全球化的回應是內部改革及國際合作¹⁵政策。．．．與世界上低工資國家的成本降低競賽，德國沒有贏的可能。我們想在國際競爭中生存，就必須比我們的競爭者更有競爭力、更優秀。．．．全球化的市場需要一個新的、公平的世界經濟秩序，此一新世界經濟秩序遵循的是社會及環保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藉著供給和需求政策聰明且實際的結合，我們希望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成長和新工作位置。」社民黨許諾若贏得大選，將減輕勞工及家庭的賦稅（Lafontaine 1999：113）。柯爾執政時期，刪除了一些勞工權益，社民黨表示將更正柯爾的錯誤，恢復這些勞工權益，包括恢復病假期間工資的繼續給付、小企業勞工的解雇保護、建築工人的惡劣天氣津貼（Lafontaine 1999：101-104）。這份施政計劃基本上是拉豐坦的理念，而且對稅制、社會福利等問題做了具體的承諾。社民黨總理候選人施洛德當然也在這份施政計劃上簽了字，然而當時即有評論者認為，「現代化者」施洛德是在「[左翼]傳統主義者」拉豐坦的強迫下，才為此份施政計劃背書（Lafontaine 1999：107; *Der Spiegel* 1999（40））。

社民黨贏得選舉後，拉豐坦出任財政部長。在稅制改革上，社民黨執政後減輕家庭和中小企業的負擔，但卻不利於大企業，因此遭到經濟界和在野黨基督教民主聯盟 / 基督教社會聯盟（CDU/CSU）的強烈抨擊。論者以為，新稅制基本上也是拉豐坦版¹⁶（*Der Spiegel* 1999（11）a），不過在提出前，由於施洛德的施壓，拉豐坦才做了一些修改（*Der Spiegel* 1999（11）b）。拉豐坦在位時，經濟界對社民黨頗為

¹⁵ 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¹⁶ 不過在拉豐坦辭職後，施洛德總理辦公室主任 Hombach 接受訪問時強調，新稅法是政府共同制定出的（*Der Spiegel* 1999（11）a）。

失望，而黨內的改革左派（「現代化者」）則覺得施展不開，似乎一切都由拉豐坦主導（*Der Spiegel* 1998（46））。

拉豐坦在位時，亟欲實現兩項政策，其一是調降利率，其二是所謂的「匯率目標區域模式」（均詳下）。他視前者為兼顧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的法寶，視後者為穩定國際金融秩序的法寶。然而，這兩項政策主張的實現，均無關財政部長的職責，而是德國聯邦銀行甚至各國央行的權限。結果，拉豐坦不但無法成功推動這兩項政策，反而在國內或國際上，似乎都成了麻煩製造者。社民黨執政後，根據德國聯邦勞動局於 1998 年十二月的統計，德國的失業人口較 1997 年同月減少了 7.2%（Kühl 1999）。然而德國經濟界對拉豐坦敵意頗深，歐元貶值，加上拉豐坦與施洛德領導的黨內「現代化者」格格不入，尤其與總理辦公室主任（部長級政務官）Hombach 衝突不斷（*Der Spiegel* 1999（11）b），以其率直的性格及堅持政治要講原則的信念，終於在 1999 年三月十一日，通知總理施洛德，同時辭去黨主席、財政部長及國會議員三項職務。

拉豐坦辭去所有政治職務退隱的舉動，震驚了德國各界。然而經濟界立刻表示歡迎。「德國工商會議」（*Deutsche Industrie- und Handelstag*; DIHT）表示，拉豐坦與經濟界間確實存在著很深的歧見，希望在拉豐坦辭職後，德國政府能改採有利企業投資的政策，因為拉豐坦僅針對提高內部需求而設計的財稅及預算政策，已經宣告失敗了。「德國雇主協會」（BDA）主席 Dieter Hundt 表示，一位支持需求政策的部長辭職，是值得祝賀的。「德國工業協會」（*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主席 Hans-Olaf Henkel 認為，拉豐坦的辭職，使人得以期望執政黨中對經濟界友好且俱改革意願的力量能夠壯大起來。Julius Bär 銀行的經濟學家 Gerhard Grebe 更指責拉豐坦是政府中的黑羊及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並認為拉豐坦與歐洲中央銀行間的紛爭是歐元疲軟的主要原因（*Spiegel Online* 1999.03.11）。

拉豐坦辭去所有政治職位後，總理施洛德兼任社民黨主席，其「新中間」路線才有機會正式登場，社民黨 - 綠黨聯合政府開始政策大轉

向，施洛德且強化了改革左派的國際造勢活動。1999 年六月八日，施洛德與英國首相布萊爾共同發表了《歐洲社會民主向前之路》(*Der Weg nach vorne für Europas Sozialdemokratie*) 宣言，兩人信心滿滿地認為，第三條路和「新中間」政策未來可能成為歐洲的新希望 (Perger 1999b)。

然而在左翼人士眼中，這份宣言標示著德國社民黨的徹底轉向 (Peter Schwarz 1999)。雖然拉豐坦已離職，然而社民黨左翼的勢力依然非常強大，社民黨 298 位國會議員中，有 160 位屬左翼 (*Spiegel Online* 1999.09.01a)。而且，如同前已述及的，「新中間」口號無法說明甚麼，具體的政策才是關鍵所在。因此，布萊爾 - 施洛德宣言在社民黨內部引發爭議，是完全可以想像的。薩克森 - 安哈特 (Sachsen-Anhalt) 邦總理 Reinhard Höppner 便認為，關於社會與經濟前途的問題，確實不能再在左與右的範疇中尋找答案。然而真正重要的決定 (即實質政策)，還沒有被提出來 (*Die Zeit* 1999 (31))。屬左翼的社民黨青年黨部前主席 Andrea Nahles 也批評，在宣言中根本看不到甚麼願景，而只有兩個關鍵字：「適應」與「彈性」，亦即彈性地適應既有的社會與經濟發展趨勢。然而宣言沒有分析，為甚麼既有的社會與經濟發展趨勢，值得我們彈性地適應 (*Die Zeit* 1999 (28))。較露骨的批評則指責第三條路披著改革的外衣，實際上是對政治的放棄和對資本主義的投降 (Perger 1999c)，根本就是新自由主義 (Peter Schwarz 1999)。

拉豐坦下台後，施洛德確實推動了一些偏向供給政策的措施，然而由於黨內的反彈及邦選舉的連續失利，1999 年末，他又轉而迎合黨內左翼。以下詳論拉豐坦與施洛德在觀念、政策上的異同，及拉豐坦辭職後施洛德如何實踐他的「新中間」路線，又如何「由右返左」。

(三) 拉豐坦的「需求政策」vs.「新中間」的「供給政策」

在德國談論「全球化」有如我們在台灣談論「競爭力」，而且這

是延續德國傳統上對所謂經濟或工業「駐地」(Standort) 競爭力的討論。駐地原是一個軍事用語，軍隊要選擇適當的駐地，經濟和工業亦然，德國是否是一個良好的經濟和工業駐地呢？德國企業界向來喜歡說，德國過高的社會福利、勞工權益及環保標準，破壞了德國做為一個經濟駐地的競爭性。而冷戰結束後，成熟的全球化逐漸形成，為這種主張提供了新的合法化來源，亦即競爭已無疆界，德國若再不改弦易轍，將無法與低工資、低社會福利與低環保標準的國家競爭。

1998 年德國大選前，這種思想已經影響到部份社民黨人士。他們越來越相信新自由主義及「供給政策」(Angebotspolitik)，媒體稱這些人為「現代化者」(Modernisierer)，以表示他們願意改革社會民主黨的傳統意識形態。「現代化者」認為，德國已經是一個糟糕的經濟駐地，不再有競爭力，面臨東亞新興國家的威脅尤其顯得無助。因此，德國應致力於恢復其競爭力，而方法則是工資零成長、刪減社會福利、降低企業稅、減少勞工權利（此即所謂的供給政策）。然而當時黨內左翼仍能抵制此一潮流，尤其自 1995 年起左翼大將拉豐坦任社民黨主席，極力阻止供給政策思想在黨內擴散。對於駐地問題，拉豐坦及其顧問，時任「德國經濟研究中心」(DIW)「經濟景氣組」組長的 Heiner Flassbeck 提出反駁說，關於德國作為一經濟駐地的評估，應根據客觀數據。客觀數據顯示，1995、1996 年，德國的外貿盈餘均有約 1,000 億馬克，德國的人均出口值名列世界第一，馬克也能維持強勢，而德國對外投資的高金額，是德國企業強大的表現（亦即企業並非因德國投資環境惡化而出走 - 本文作者）。因此，德國一直是一個很好的經濟駐地。德國的優勢是勞工、工程師、經理人員的高素質、高工作動機和發明的精神，以及良好的基礎結構和社會穩定性。因此，德國應追求供給和需求政策兼顧的雙重策略。1998 年大選前，拉豐坦藉其黨主席的地位，成功地使他的觀點成為社民黨的經濟基本政策（Lafontaine 1999：46-48）。

大選前，拉豐坦及其夫人，弗利德利希·艾伯特基金會（Friedrich-Ebert-Stiftung）經濟政策組研究助理 Christa Müller，合著

了《不要懼怕全球化 - 給所有人富裕和工作》(*Keine Angst vor der Globalisierung – Wohlstand und Arbeit für alle*, Frankfurt/M) 一書。兩人在書中指責當時的柯爾政府將高失業率、政府赤字、勞工所得稅及社會保險費負擔的加重不正確地歸咎於全球化。認為「面臨全球競爭只有不斷降低支出才能生存」的想法是錯誤的 (Lafontaine/Müller 1998 : 15), 恰恰相反, 20 年代末經濟大恐慌即是貶值競爭的結果 (Lafontaine/Müller 1998 : 19)。

拉豐坦及 Müller 還認為, 失業問題不能透過工資零成長¹⁷政策解決。柯爾時代所追求的工資零成長和其它加重勞工負擔 (以減輕富裕者負擔) 的政策, 不僅破壞了社會正義, 還導致了需求下降, 而需求下降阻礙了經濟成長, 結果是製造了更多的失業者。然而工會這一方面亦不應一味要求加薪。理想的工資政策應該是「生產力取向」, 亦即工資的高低與生產量或盈餘聯繫起來。這種工資政策能促進成長, 最後創造出更多的工作位置 (Lafontaine/Müller 1998 : 23-24; 311-314)。

大選前, 拉豐坦認為, 對抗全球資本主義是歐洲社會民主黨及社會主義國際的重要任務。為了推動有效的歐洲就業政策, 拉豐坦準備進入內閣 (Lafontaine 1999 : 27)。拉豐坦認為, 財政部長是最能為減少失業做出貢獻的內閣閣員, 因此決心在取得政權後, 出任財政部長 (Lafontaine 1999 : 112)。依他的看法, 失業率是經濟與財政政策完善與否的指標, 失業率高表示經濟與財政政策出了問題。拉豐坦援引凱因斯及 MIT 經濟學教授 Paul Krugman 的看法, 主張貨幣政策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對抗失業 (Lafontaine 1999 : 52), 且認為低利率政策是美國失業率得以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Lafontaine 1999 : 58)。

然而在歐洲盛行的觀念卻是: 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是維持物價的穩定, 牽涉就業率的不是貨幣政策而是工資政策。Lafontaine 不同意這種觀念, 並將德國高失業率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德國聯邦銀行的穩定

¹⁷ 這裡是指實質零成長, 亦即工資成長的幅度僅能抵銷通貨膨脹率。

政策 - 以高利率抑制通貨膨脹 (Lafontaine 1999 : 53)。由於拉豐坦視降低失業率為社會民主政府的主要任務，因此就任財政部長後即要求調降利率，以促進歐洲的經濟成長與就業。但利率政策傳統上屬央行的權限，而且德國聯邦銀行不認同拉豐坦的觀點，不願意調降利率。拉豐坦認為，央行的貨幣政策不受任何其他政治力量的節制，是不民主的，這並且阻礙了合理的經濟政策的推動。拉豐坦此種看法遭到視央行獨立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人士的猛烈抨擊，終其任內，他與德國聯邦銀行及歐洲中央銀行的關係因此經常處於緊張狀態。然而部份歐盟成員國的總理及財政部長支持拉豐坦的觀點，亦即認為歐洲當時面臨的風險並非通貨膨脹，而是疲軟的需求 (Lafontaine 1999 : 53-55)。總之，拉豐坦不認為德國面臨全球競爭必須犧牲社會福利與勞工權益。在他眼中，德國仍極具競爭優勢，而且透過調降利率刺激需求的方式，德國的經濟能再現高成長。

施洛德的「新中間」則傾向供給政策。前述施洛德與布萊爾聯合發表的《歐洲社會民主向前之路》宣言即有言：「過去社會民主黨人常使人誤以為，單靠有效的需求調節，就能創造成長和高就業率。」這是在駁斥時已辭職的拉豐坦的最愛 - 需求政策。宣言強調供給政策的重要性，提倡較低的企業稅、對中產階級的積極支持、有彈性的勞動市場、減少過度的控制。宣言認為社會福利的目的是要使人能重新倚靠自己，因此，(例如失業問題)，失業的時間應該用來接受新的職業訓練 (以備重新投入職場)，而兼職工作和收入微薄的工作都要比完全沒有工作好。宣言也強調節約預算和降低赤字的重要性，並表示此為馬斯垂克條約的要求 (Perger 1999b)。

施洛德的謀士 Hombach¹⁸在社民黨於 1998 年九月二十七日贏得

¹⁸ 有趣的是，本文所提到的幾位政治領導人，身邊都有重要的謀士。拉豐坦的謀士是其夫人 Christa Müller 及 Flassbeck；柯林頓的謀士是其夫人希拉芮及 Sidney Blumenthal；布萊爾的謀士是 Mandelsohn；施洛德的謀士則是 Bodo Hombach，施洛德許多政策的制定，都有 Hombach 的參與。

Hombach 出身企業界，曾任 Preussag 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並為前北萊茵 - 西發利亞 (Nordrhein-Westfalen) 邦總理 Johannes Rau (現為德國總統) 及施洛德策劃過選舉。1998 年六月至十月，Hombach 任北萊茵 - 西發利亞邦經濟部長，之後出任施洛德總理辦公室主任。拉豐

大選後，出版了《突破 - 新中間政策》(*Aufbruch :Die Politik der Neuen Mitte*, München) 一書。基本上，該書可以表達施洛德的施政理念。以筆者之見，Hombach 著作中的一個中心觀念是：社會福利要能支持個人的主動性及責任感 (Hombach 1998: 199-200)，這與後來的布萊爾 - 施洛德宣言對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¹⁹ Hombach 在書中主張調和供給政策和需求政策 (Hombach 1998 : 154-155)，然而實際上 Hombach 的觀點是十分偏向供給政策的(或者如同 Hombach 所說，是一種「左派的供給政策」(*Der Spiegel* 1999 (11) b))，筆者以下列三項 Hombach 的具體主張來說明此點：

1. 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亦即勞動者不應再視全職、終生的工作為理想工作的唯一形式。以兼職工作的形式來分配既存的工作位置，是降低失業率的良好策略；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工作時間的彈性化，以降低每週工作時數（但同時亦降低月工資）的方式，使更多人能獲得工作位置 (Hombach 1998 : 185)。又，在經、社環境急遽變遷的時代，人人都應有更換工作的心理準備，因此職業再教育非常重要 (Hombach 1998 : 188)，因為它能使轉換工作或再工作變得較容易，而無工作、失業的時間，應該用來接受再教育 (Hombach 1998 : 198)。

2. 要實現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必須提高低工資和非正規工作(即兼職工作) 的吸引力：低工資和非正規工作也能朝向正規工作發展，但必須增加其吸引力。然而，現有的福利制度使人只能在全職工作和失業之間選擇，因為在現有的制度下，低工資工作的所得，在扣除所得稅及社會保險費後，可能比失業者領的社會救濟金還要少，因此要增加低工資工作的吸引力，其前提是降低低工資受雇者的社會保險

坦在位時，與 Hombach 迭有衝突。而拉豐坦辭職後，1999 年六月，施洛德決定解除 Hombach 總理辦公室主任的職位，轉任巴爾幹事務的總理特派員。表面上這是施洛德借用 Hombach 的長才，但拉豐坦認為真正的原因是，Hombach 與其他閣員亦不和，施洛德不得不請其離開總理府 (Lafontaine 1999 : 129)。

¹⁹ 接拉豐坦任財政部長的 Hans Eichel 也曾表示，國家應能擔保每一個人都根據其能力為國家的維持做出貢獻 (*Der Spiegel* 1999 (37))。

費，其差額則由國家補助（Hombach 1998：202-203）。

3. 由於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日益提高，德國現有的法定退休制度 - 所謂的「世代契約」(Generationsvertrag)，將難以保障未來的退休者。所謂「世代契約」是指，目前有工作的人繳納退休保險費，以供養目前的退休者；目前有工作的人退休後，其退休金又要靠下一批工作者繳納的退休保險費供應。以德國人口的發展趨勢，退休者越來越多、工作者越來越少，未來退休者的退休金勢必越來越難維持理想的水準。關於此一重大問題，有各種各樣的建議（參閱孫治本 1995），Hombach 提出的對策明顯地是偏向新自由主義的，亦即：退休後的生活不能只靠法定退休保險，應另輔以私人退休計劃，亦即個人應另以儲蓄、購買私人保險、投資等方式，為退休後的經濟來源做準備（Hombach 1998：205-218）。

以上第一點與第二點有直接的關聯，而三項主張的目的，其實都是為了減低企業的人事成本負擔（亦即一種供給政策），這裡牽涉的是所謂的「工資附加成本」(Lohnnebenkosten)。由於德國的各項社會保險費，係由雇主及受雇者各負擔二分之一，因此，雇主除了需負擔工資成本外，還需負擔這二分之一的社會保險費。這二分之一的社會保險費，就是一種工資附加成本（其它還有休假、病假期間繼續給付的工資等等）。Hombach 建議，降低甚至免除低工資受雇者的社會保險費，改由國家補貼，則雇主負擔的二分之一社會保險費也會相應降低或免除，這實際上是要將這一部份原本由雇主負擔的工資附加成本，改由所有納稅者負擔。而以私人方式補充法定退休保險制度，也有降低或至少不必一再增加法定退休保險費的作用，這也可為企業減少工資附加成本。因此，Hombach 的這些方案，新自由主義的色彩很濃。

不過，關於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左翼的拉豐坦並非全然反對。所謂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實牽涉德國社會對勞動及職業生涯觀念的轉

換。按，社會福利制度的方向與一個社會對於勞動及職業生涯的觀念習習相關。近年來失業率呈現較大幅度減低的美國與英國，有可能係賴增加低收入工作及部份時間工作(兼職工作)的方式減少失業率(關於美國的就業政策，參閱 Leutenecker 1999)。而德國社會則仍視全職、終生的工作為理想的工作形式。然而即使如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已提出改變此種觀念的呼籲。不論是拉豐坦或施洛德，均贊成所謂的「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但拉豐坦認為對此要有充分的討論和規劃(Lafontaine 1999: 163))，即認為收入低微、部份時間的工作，也要比不工作(失業)好，其背後隱含的是社民黨的社會政策基本理念，越來越偏離「社會國家的必要條件模式」(Modell des Sozialstaatspostulats)，而趨向右派政黨所主張的「補充模式」(residuales Modell)。按，前者視社會福利為獨立於市場及個人自助原則以外，且與兩者俱同等重要性的制度；「補充模式」則強調個人自助的能力，社會福利的目的則是在市場及個人自助失靈時，發揮救急的作用(Murawieck 1992: 64-65)。社民黨主張提高低工資和非正規工作(即部份時間工作)的吸引力，使失業者脫離依賴社會救助的生活，重新投入職場，即是「補充模式」的體現。

(四) 跨國政治：激進的拉豐坦、溫和的施洛德

按，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主張政治不應干預經濟全球化。激進立場的第三條路，例如英國的布萊爾路線，在此點上頗為接近新自由主義。溫和立場的第三條路，雖然接受經濟全球化的不可逆轉性，但主張以政治力量規範經濟全球化(參閱表一)。而足以規範經濟全球化的政治力量，無法由個別民族國家提供，唯有透過跨國合作的方式。在這一點上，施洛德與拉豐坦的基本主張是倒是相同，這符合前述「德國對跨國政治特別支持」的論點，只是拉豐坦較施洛德激進。英國則與德國形成明顯的對比，前述英國拒絕受以多數決決定的歐盟社會政策的束縛(見註釋 7)，即顯示出英國反對跨國政治(跨國內

政)的立場。

拉豐坦及其夫人合著的《不要懼怕全球化 - 給所有人富裕和工作》一書中，即援引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根源 - 所謂「佛萊堡學派」(Freiburger Schule)的觀點，認為自由競爭的市場並非天生的，而是需要國家建立起一套秩序，才能創造和維持自由競爭。當市場經濟主要在民族國家的疆域內運作時，國家本身便可負起維持自由競爭秩序的任務。但當市場經濟已經超越了國界，以全球為運作範圍時，便需要世界性的競爭秩序。目前這種世界性的市場經濟秩序尚未被建立起來，導致資本主義越來越不受政治的束縛。想建立起全球市場秩序，只有靠跨國合作，諸如匯率的穩定化、穩定和成長取向兼顧的利率政策、國際社會憲章(亦即全球一致的社會福利最低標準)、公正的財稅政策(例如以俱國際有效性的最低稅率來阻止企業稅的一再降低)等，都只有透過跨國合作才能實現(Lafontaine/Müller 1998: 18-19; 53-82)。拉豐坦在其友人貝克於同一年主編的《全球化政治》(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一書中，另發表了〈全球化與國際合作〉(Globalisierung und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Lafontaine 1998)一文，清楚扼要地說明了其國際合作主張。前述大選前社民黨的施政計劃，亦以「國際合作」作為對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回應手段之一。

拉豐坦就任財政部長後，亟欲透過國際合作，遏止熱錢不適當的流竄所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及社會動盪，其具體政策，即拉豐坦上台後被延攬為財政部次長的 Flassbeck 所提出的「匯率目標區域」(Zielzonen für Wechselkurse)模式(主要是應用在歐元、美金及日元之間)。

Flassbeck 認為，在金融全球化、熱錢四處流竄的今天，浮動匯率與固定匯率兩種制度都有問題，因此提出了匯率目標區域模式。我們可以下例(參閱表二)來說明此一理論：甲國的通貨膨脹率高達 10%，與此相應，其名義利率也高達 12%，然而與通貨膨脹相抵，實質利率只有 2%；乙國的名義利率雖只有 4%，但因其通貨膨脹率只

有 2%，因此實質利率與甲國一樣是 2%。然而投資者會選擇將乙國的貨幣換成甲國貨幣並存於甲國，因為雖然甲國的實質利率也是 2%，但由於投資者並不需要用這筆錢在甲國消費或購買生產設備，因此不必考慮甲國高達 10% 的通貨膨脹率，反而甲國高達 12% 的名義利率能使投資者的存款快速增加，能換回更多的乙國貨幣。

由於熱錢從乙國流向甲國，如果匯率可浮動，將出現甲國貨幣升值、乙國貨幣貶值的現象。通貨膨脹率高的甲國，其貨幣反而升值，這是不符合甲國的經濟狀況的，久之必然造成像泰國金融危機那樣的崩盤局面。如果為了避免此一問題而採取固定匯率，亦即甲、乙兩國間之匯率不變，然而由於甲國的通貨膨脹率高於乙國，將使得甲國的出口物價相對於乙國的出口物價呈現上漲的趨勢，Flassbeck 認為，雖然兩國的名義匯率不變，但在此種情況下甲國貨幣對乙國貨幣實質上升值了，其結果將是甲國的出口衰退、乙國的出口成長。

為了避免上述兩種問題，應該讓甲國的貨幣貶值 8%（也就是乙國的貨幣升值 8%），如此，儘管甲國的名義利率高達 12%，但因貨幣貶值 8%，存放在甲國的存款實質上只能獲利 4%，與存在乙國相同，熱錢即無必要從乙國流向甲國。這種在考慮通貨膨脹率後，有控制的貶值和升值的做法，即是所謂的匯率目標區域模式。Flassbeck 認為，此一政策能使甲、乙兩國間的「實質」匯率保持穩定，同時能避免甲、乙兩國間的貿易因通貨膨脹率的差異而失去平衡。

表二：Flassbeck 的匯率目標區域模式

	甲國	乙國
通貨膨脹率	10%	2%
名義利率	12%	4%
實質利率	2%	2%

	甲國	乙國	後果
浮動匯率	幣值升	幣值貶	幣值不符兩國實際經濟狀況
固定匯率	出口物價漲； 幣值實質升值	出口物價跌； 幣值實質貶值	甲國出口衰退， 乙國出口成長
匯率目標區域	幣值貶值 8%； 有控制的貶值	幣值升值 8%； 有控制的升值	實質匯率保持穩定； 兩國維持貿易平衡

Der Spiegel 1998 (47) b。

毫無疑問，匯率目標區域模式需要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央行支持和合作才能實現。法國 Jospin 領導的內閣，其立場亦主張歐洲經濟應受政府的控制 (Touraine 1999)，而法國財政部長也支持拉豐坦穩定國際金融市場的政策。然而德國 (*Der Spiegel* 1998 (47) a)、美國 (*Der Spiegel* 1999 (11) b) 等主要國家的央行均強烈反對此一構想。在國際合作議題上，拉豐坦還要求統一歐盟各國的稅率，此亦遭大多數其他歐盟國家財政部長的反對 (*Der Spiegel* 1999 (11) b)。

拉豐坦的匯率目標區域模式，是一種較激進的約束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跨國政治手段，實現的機會渺小。施洛德雖不贊成此種激進的方式，但其於 1999 年十二月舉行的社民黨黨代表大會中，公開要求統一歐盟各成員國的資本稅 (詳下)，則顯示其亦贊成透過跨國政治防止稅差引起的熱錢竄流。

1999 年十一月間，英國行動電話集團 Vodafone 意欲對總部位於德國的 Mannesmann 集團進行「敵意兼併」(即不經對方管理階層同意，而在股票市場搜購股票的方式達成兼併)，施洛德公開聲援 Mannesmann，並呼籲歐盟立法限制「不付現金、而以股票換股票的

併購方式」(*Spiegel Online* 1999.11.20a)，此舉遭到英國媒體的批評 (*Spiegel Online* 1999.11.20b)。十二月初，荷蘭籍的歐洲央行行長 Wim Duisenberg 評論歐元貶值的原因時，也譴責施洛德限制敵意兼併的言論及救援瀕臨破產的德國 Philipp Holzmann 營造公司，兩項舉動破壞了歐元的形象 (*Spiegel Online* 1999.12.03e)。這是說，兩項舉動破壞了歐盟區域內市場自由的形象。然而施洛德的做法一方面有恢復其在黨內、外聲望的用意 (*Spiegel Online* 1999.12.03d)；另一方面，前一行動表現出施洛德「以跨國政治規範資本流動」的立場，後一行動則體現德國傳統的「社群資本主義」(communitarian capitalism) (Thurow 1992: 32)，其精神之一即是政府對企業的援助。

(五) Excursus：環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結合 - 綠黨的「第三條路」

這裡還必須說明一下與社民黨聯合執政的綠黨的「第三條路」。這幾年，綠黨黨內的「現實派」(Realo-Flügel) 早已是主流派。現實派領導人 Fischer，也在 1998 年大選前出版了《為了一個新的社會契約：對全球革命的政治回應》(*Für einen neuen Gesellschaftsvertrag : Eine politische Antwort auf die globale Revolution*, Köln) 一書，闡述政治理念。在書中，Fischer 提出了綠黨特殊的「第三條路」，亦即認為：「德國的工作太貴，環保太便宜。」至於該如何降低德國的工作成本，Fischer 認為，降低淨工資會影響經濟發展，而且破壞了社會正義，因此並非適當的方式。適當的方式是降低社會保險費，這一方面可提高淨工資，一方面可減輕企業的工資附加成本負擔。而減少的社會保險費可由環保稅 (主要是能源稅) 來補貼 (Fischer 1998 : 252-253)。如此，Fischer 巧妙地使新自由主義與環保主義結合起來。降低社會保險費，正是社民黨「現代化者」的重要政策。而社民黨也接受綠黨開徵環保稅的主張。因此，社民黨 - 綠黨執政後，確實實現了以環保稅降低工資附加成本的政策 (*Der Spiegel* 1999 (37))。

按，綠黨獲得執政權後，現實派的聲勢更上一層樓，綠黨變得越來越「有彈性」，越來越能「適應」。據拉豐坦透露，綠黨在黑森(Hessen)邦選舉失利後，拉豐坦與 Fischer 談到綠黨的未來，Fischer 竟然表示，綠黨應以經濟自由主義的立場重新贏得選民。綠黨國會黨團主席 Rezzo Schlauch 也向經濟界示好 (*Der Spiegel* 1999 (11) b)。所以基本上，綠黨成了施洛德「新中間」路線的堅實盟友。然而綠黨內部也有人反對新中間路線 (Lafontaine 1999 : 156-157)。

(六) 拉豐坦下台後「新中間」路線之實施及轉向

以下要說一下拉豐坦去職後施洛德推動了哪些具體的「新中間」政策，以及在遭受黨內左翼反彈及選舉失利後，又如何向左靠攏。

1. 「新中間」的供給政策：

(1) 計劃降低企業稅及所得稅最高稅率：

拉豐坦的兩大主張 - 調降利率及匯率目標區域模式，當然被拋到九霄雲外了。社民黨左翼的要求：未提供學徒位置的企業，要繳納教育捐；以及拉豐坦禁止加班的要求，在拉豐坦辭職後，都無法實現 (*Der Spiegel* 1999 (11) b)。拉豐坦主導、令企業界不悅的稅制改革法則已通過。當時施洛德表面上同意拉豐坦的主張，骨子裡卻反對，事後並計劃從 2000 年起，將企業盈餘稅的最高稅率降為 35%，同時降低所得稅最高稅率，以贏取企業及高收入者的歡心 (*Der Spiegel* 1999 (11) b)。按，拉豐坦雖亦贊成降低企業盈餘稅，但幅度較小 (Lafontaine 1999: 168)。

(2) 計劃降低低工資工作的所得稅率及社會保險費：

其理由是前面說過的：增加低工資工作的吸引力；實質上也是為了減輕企業的工資附加成本。然而國家為補貼減少的社會保險費收

入，可能要增加 150 至 200 億的支出（*Der Spiegel* 1999（11）b）。

（3）法定退休金制度的改革：

這是最引起爭議的一項政策。

1999 年八月間，社民黨和綠黨國會黨團決議，2000 及 2001 這兩年，法定退休金不隨平均淨工資的發展²⁰（通常均會成長）調整，而根據通貨膨脹率調整（預估 2000 年的通貨膨脹率是 0.7%，2001 年是 1.6%）。由於一般平均淨工資的成長幅度都會高於通貨膨脹率，這等於是宣佈減緩未來兩年法定退休金的成長幅度，引起全國爭議，基民 / 基社聯盟及工會均強烈反對（*Der Spiegel* 1999（35））。然而執政黨也確有特殊理由在未來兩年這麼做，因為執政黨的減稅及降低社會保險費政策，會使平均淨工資突然升高（淨工資即是毛工資減去所得稅及社會保險費）。問題是兩年後呢？這就有各種意見了。

接任拉豐坦財政部長職位的 Eichel 曾表示，由於大幅減稅，使平均淨工資升高，因此法定退休金不能隨淨工資增長，但應隨社會生產力成長（*Der Spiegel* 1999（37））。1999 年八月三十一日，綠黨國會黨團於威瑪（Weimar）舉行的研討會中，一度傾向於使法定退休金水準普遍地與平均淨工資的發展趨勢脫離關係。該黨退休金專家 Katrin Göring-Eckardt 甚至建議，將退休金水準由退休前最後淨工資的 70% 降為 65%。這充分顯示出綠黨在社會福利問題上的新自由主義色彩。然而這種主張是非常不得民心的，連施洛德都表示反對。於是隔日 - 九月一日，綠黨黨團即轉向，改而支持自 2002 年起就使退休金水準再度依平均淨工資的發展調整，但家庭和子女享有的所得稅寬減額不應列入淨工資計算（*Spiegel Online* 1999.09.01b）。

此外，社民黨有意鼓吹以私人退休計劃補充法定退休保險制度。起初，勞工部長 Riester 甚至建議強制性的做法，亦即強制受雇者將一部份的工資轉為儲蓄或投資，以為退休後的部份經濟來源。然而由

²⁰ 在德國「一九九二年退休保險改革法」通過前，德國法定退休金水準的調整係依循平均毛工資的發展，1992 年起，則改依平均淨工資的發展調整。

於反對的聲浪太大，社民黨放棄了此一想法，但仍鼓吹自願的私人退休計劃。財政部長 Eichel 且說，減稅可使低收入者也有能力儲蓄或投資（*Der Spiegel* 1999（37））。而與社民黨「現代化者」一樣，綠黨也主張受雇者應有私人退休計劃，但無論如何，國家應提供基本的退休保險，以確保退休者不必求助於社會救濟金。總之，執政黨的退休政策可說搖擺不定，對此德國「全國社會聯盟」（Sozialverband Reichsbund）及「德國職員工會」（Deutsche Angestellten-Gewerkschaft; DAG）均公開表示反感（*Spiegel Online* 1999.09.01b）。

（4）節約預算政策：

財政部長 Eichel 的節約預算政策，要減少 300 億馬克的政府支出。對此，黨內左翼直接批評其為新自由主義政策（*Der Spiegel* 1999（37））。拉豐坦任內的財政部次長 Flassbeck（時已離職）也公開說，一方面準備降低企業稅，卻又要減少政府支出，這對企業獲利是不利的，更無助於減少失業率（*Spiegel Online* 1999.10.01）。

2. 施洛德向左轉

「新中間」路線實施以來，社民黨 - 綠黨接二連三地在邦選舉中失利，給了社民黨左翼攻擊的理由。已經退隱的拉豐坦，亦在媒體上批評說，社民黨一連串選舉失利，是施洛德政策的當然結果；工資不漲、削減政府預算、高實質利率的三合一政策，只會導致高失業率（*SZ on Net* 1999.09.27）。甚至因為社民黨、綠黨的「新中間」色彩日益濃厚，使得原本勢力局限於德東的「民主社會主義黨」（PDS；由原東德執政黨「社會主義統一黨」（SED）演變而來），有機會在德西爭取左派或對現狀不滿的選民。在 1999 年九月北萊茵 - 西發利亞（Nordrhein-Westfalen）邦及十月巴登 - 符騰堡（Baden-Württemberg）邦的地方選舉中，PDS 首次得以進入兩邦部份縣、市議會（*Staud* 1999）。

為了重新贏得黨內左翼的支持，施洛德因此決心向富人開刀，以建立其重視社會正義的形象。1999年十二月七至九日，社民黨在柏林舉行執政後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前施洛德提出了「財稅政策五點方針」，其五點方針如下(*Spiegel Online* 1999.12.03a; 參閱 *Spiegel Online* 1999.12.03b)：

(1) 改革基金會法，使公益基金能獲得更多的免稅優待；

(2) 對於資本收入的課稅，需要一個「歐洲解決方案」，其意即統一歐盟各成員國的資本稅，為此施洛德將向歐盟其他成員國施壓。如果此法不通，則採行「民族國家的方法」，意即德國加強監控從德國轉入其他國家的資本；

(3) 加強查緝逃漏稅；

(4) 擴展勞工參與生產資本的可能性；

(5) 改以交易值評估房地產在計算遺產稅、贈與稅及財產稅(*Vermögenssteuer*)中的價值，這將使遺產稅及贈與稅的金額提高(目前德國則並無財產稅)，但同時應研擬提高遺產稅的免稅額，以照顧中、下階層的遺產繼承，新法也不應阻礙中、小企業的繼承。

以上五點方針中，以第五點最為重要，甚受黨內左翼的歡迎；但黨內左翼仍認為施洛德做得不夠，因為施洛德拒絕他們恢復財產稅的要求(*Spiegel Online* 1999.12.03c; Schmid 1999; SZ on Net 1999.12.04)。黨代表大會舉行前，黨內左翼再度呼籲，在社會正義的爭論上，施洛德應向左翼的方向跨一步(*Die Welt* 1999.12.07)。在代表大會上，施洛德提高遺產稅的建議，獲得大部份代表的支持，但恢復財產稅一事，則仍有爭議(*Die Welt* 1999.12.09)。

四、討論與結語

拉豐坦與施洛德都不是傳統左派，都在尋找第三條路，但前者是堅定不移的需求政策信徒，後者的施政則是供給政策與政治投機主義的混合。從政治風格而言，施洛德的政策頗為搖擺不定，選舉結果、民調支持度均可能改變其施政方向（其「財稅政策五點方針」明顯地在討好黨內左翼），此與表一 Meyer 所說的「〔注重〕文化活動、受媒體主導的溝通」的政治策略相符。所以，「新中間」的政治投機主義性格很濃。*The Economist* 曾評論施洛德：「當然，務實主義沒有錯。但是施洛德先生似乎不知道要使其通往何方。」（*The Economist February 12th 2000*：23）執政後，綠黨「現實派」的政治投機色彩也是有增無減。而認為「政治要講原則，否則只是權力欲的滿足」（SZ on Net 1999.09.27）的拉豐坦，可以突然辭去所有三項政治職務，又顯得較缺乏妥協的精神。

而在施政理念及具體政策上，筆者以表三列出拉豐坦（或其他社民黨左翼）路線與施洛德的「新中間」路線之異同：

表三：拉豐坦（或其他社民黨左翼）路線
與「新中間」之比較

政策	拉豐坦 （或其他社民黨 左翼）	「新中間」
以跨國政治約束 經濟全球化	贊成，且較激進 （匯率目標區域）	贊成，但較溫和
以貨幣政策對抗失業	贊成	反對
節約預算政策	反對	贊成
勞動市場的彈性化 （鼓勵部份時間工作）	（有保留地）贊成	贊成
降低低工資工作的社 會保險費（亦即降低工	贊成	贊成

資附加成本), 其差額 由國家補助		
禁止勞工加班	贊成	反對
降低 2000 及 2001 年法 定退休金的成長幅度	反對	贊成
提高遺產稅	贊成	贊成
恢復財產稅	贊成	反對

拉豐坦基於需求政策立場所主張的「以貨幣政策對抗失業」, 及施洛德基於供給政策立場所提出的「節約預算政策」, 表現出兩人從不同政治經濟學觀點出發所形成的政策歧異。施洛德一派的社民黨人, 且鼓吹以私人退休計劃補充法定退休保險制度, 此即上文「補充模式」的體現。起初, 勞工部長 Riester 甚至建議強制性的做法, 然而由於反對的聲浪太大, 社民黨乃改而鼓吹自願的私人退休計劃。

然而在某些政策上, 兩人並非全然不同。例如, 拉豐坦與施洛德均贊成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及降低低工資工作的社會保險費。而施洛德雖然反對拉豐坦的「匯率目標區域模式」, 但他主張統一歐盟的資本稅, 及對國際金融市場做更多的政治規範。與英國首相布萊爾比較(參閱註釋 11), 拉豐坦與施洛德均明顯地傾向支持「以跨國(民主)政治約束全球資本主義」, 這符合我們在二 - (二) 所說的, 德國是「跨國(民主)政治」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整體而言, 即使是德國社民黨內的改革左派(「新中間」), 亦仍支持社會基本保障的維持。所以, 為了要增加低工資工作的吸引力, 一方面計劃降低低工資受雇者的社會保險費, 以提高其淨工資; 但一方面並不減少低工資工作者的福利給付, 而是由國家補貼社會保險費的差額。更何況, 1999 年底, 施洛德又「由右返左」。而 2000 年六月三日在柏林舉行的第三次改革高峰會, 亦透露「以政治型塑資本主義」的歐陸模式聲勢上揚的趨勢。

首先, 在此次高峰會上, 施洛德與較偏左的、曾說過「要市場經

濟，不要市場社會」(*The Economist February 12th 2000* : 19) 的法國總理喬斯潘互動良好。而曾與施洛德發表聯合宣言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則未出席施洛德作東的高峰會。官方的理由是：布萊爾要在家陪伴剛出生的幼子。媒體卻猜測施洛德與布萊爾漸行漸遠 (*Spiegel Online 2000.06.04a*)。

而十四國領袖在高峰會上發表的《現代統治的方針》(*Die Leitlinien des modernen Regierens*)，其中主張「企業對社群亦負有責任。」「為了維持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性，應有更強的規範與監督。」(*Spiegel Online 2000.06.04b*) 此亦表現出「社群主義」及「資本主義應受政治型塑」的精神。

如同在前言中提及的，全球化導致兩種市場經濟模式的大對抗：狂野的美式資本主義 vs. 兼重社會正義與經濟發展的歐陸模式 (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是主要代表之一)。唯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孫治本，1995，〈德國人口結構老化對法定退休保險的影響及因應之道〉，《思與言》(33-1): 135-160。

，1999，〈世紀末解構的歐洲 - 後民族國家思維、文化界限與民族國家間的交互激盪〉，《當代》(139): 80-93。

，2000，〈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思與言》(38-1): 147-184。

張亞中，1998，《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台北：揚智。

Beck, Ulrich, 1999. 《全球化危機》(孫治本譯)，台北：商務。

Bryan, Lowell/Farrell, Diana, 1997. 《無疆界市場》(汪仲譯)，台北：時報文化。

Giddens, Anthony, 1999. 《第三條路》(鄭武國譯)，台北：聯經。

Gray, John, 1999. 《虛幻曙光 - 資本市場全球化的危機》，台北：時報文化。

Murswieck, Axel, 1992. <兩德社會福利政策整合的問題和選擇> (劉岳東譯),
《「德國統一經驗和台海兩岸關係展望」研討會論文集》(「旅德中華社會科學
研究會」發行): 64-75。

Soros, George, 1998.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聯合報編譯組譯), 台北: 聯經。

二、德、英文部份：

Albrow, Martin, 1998. *Abschied vom Nationalstaat*, Frankfurt/M.

Appadurai, Arjun, 1998. Globale ethnische Räume, in Ulrich Beck (Hg.):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pp. 11-40.

Bauman, Zygmunt, 1998. Schwache Staaten: Globalisierung und die Spaltung der
Weltgesellschaft, in Ulrich Beck (Hg.): *Kinder der Freiheit*, Frankfurt/M., pp.
315-332.

Beck, Ulrich, 1998. Wie wird Demokratie im Zeitalter der Globalisierung möglich? –
Eine Einleitung, in Ulrich Beck (Hg.):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pp. 7-66.

Der Spiegel, 1998 (46) . „Nichts tun geht nicht“

(www.spiegel.de/homepage/deutschland/sp_lafont4698.html) .

, 1998 (47) a. Oskar of Werbetour

(www.spiegel.de/spiegel/deutschland/47026.html) .

, 1998 (47) b. Lust am Widerstand

(www.spiegel.de/spiegel/deutschland/47029.html) .

, 1999 (11) a. „Vielleicht ein bißchen ruhiger“

(www.spiegel.de/spiegel/deutschland/11030.html) .

, 1999 (11) b. Freie Hand für den Kanzler

(www.spiegel.de/spiegel/deutschland/11022.html) .

, 1999 (35) . Zwang zur Wende

(www.spiegel.de/spiegel/nf/0,1518,38760,00.html) .

, 1999 (37) . “Nicht herumfummeln”

(www.spiegel.de/spiegel/0,1518,41071,00.html) .

- , 1999 (40) . Das Protokoll eines Machtkampfs
 (www.spiegel.de/0,1518,44916,00.html) .
- , 1999 (42) . „Natürlich gibt es auch ein Risiko“
 (www.spiegel.de/spiegel/0,1518,47187,00.html) .
- Dichtl, Erwin / Issing, Otmar (ed.) , 1987. *Vahllens Großes Wirtschaftslexikon*,
 München.
- Die Welt*, 1999.12.07. Müntefering will die Parteilinke bändigen
 (www.welt.de/daten/1999/12/07/1207hb141385.htx?print=1) .
- , 1999.12.09. Der Kanzler verteidigt seine Wirtschaftspolitik
 (www.welt.de/daten/1999/12/09/1209hb141745.htx?print=1) .
- Die Zeit*, 1999 (28) . Blechtrommel, adieu! Der Sparhaushalt und die Philosophie der
 Neuen Mitte : Ein Streitgespräch zwischen Sozialdemokraten
 (www.Zeit.de/tag/aktuell/199928.spd-streitgesprae.html) .
- , 1999 (31) . ”Ein provokativer Denkanstoß“
 (www.Zeit.de/tag/aktuell/199931.hoeppner_.html) .
- Fischer, Joschka, 1998. *Für einen neuen Gesellschaftsvertrag – Eine politische
 Antwort auf die globale Revolution*, Köln.
- Fuchs, Werner u.a. (ed.) , 1978. *Lexikon zur Soziologie²*. Opladen.
- Gasteyger, Curt, 1997. *Europa von der Spaltung zur Einigung*, Bonn.
- Goodman, James, 1998. Die Europäische Union: Neue Demokratieformen jenseits des
 Nationalstaats, in Ulrich Beck (Hg.) :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pp. 331-373
- Habermas, Jürgen, 1998. Jenseits des Nationalstaats? Bemerkungen zu
 Folgeproblemen der wirtschaftlichen Globalisierung, in Ulrich Beck (Hg.) :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pp. 67-84.
- Harryvan, Anjo G./van der Harst, Jan (ed.) . 1997. *Documents on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 Hénard, Jacqueline, 1999. Europas dritter Dritter Weg, *Die Zeit* (39)
 (www.Zeit.de/tag/aktuell/199939.jospin_3.weg_.html) .
- Hombach, Rodo, 1998. *Aufbruch – Die Politik der Neuen Mitte* (zweite Auflage) ,

München.

Kühl, Jürgen, 1999. Neue Wege aus der Arbeitslosigkeit,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14-15, 2. April)*: 31-38.

Lafontaine, Oskar, 1998. Globalisierung und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in Ulrich Beck (Hg.):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pp. 254-262, 1999. *Das Herz schlägt links*, München.

Lafontaine, Oskar/Müller, Christa, 1998. *Keine Angst vor der Globalisierung – Wohlstand und Arbeit für alle* (zweite Auflage), Bonn.

Leutenecker, Sabine, 1999. Der Erfolg des amerikanischen Beschäftigungsmodells und seine Ursache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 14-15, 2. April)*: 24-30.

Masala, Carlo, 1997. Debatte über die institutionelle Reform der EU, *Aussenpolitik (48)*: 228-236.

McGrew, Anthony, 1998. Demokratie ohne Grenzen? in Ulrich Beck (Hg.):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pp. 374-422.

Meyer, Thomas, 1999. The Third Way at the Crossroads,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Online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ociety (3)* (www.fes.de/ipg/ipg3_99/artmeyer.html).

Perger, Werner A., 1998. Bill und Tony auf dem "Third Way", *Die Zeit (39)* (www.Zeit.de/tag/aktuell/199839.dritter_weg_.html).

, 1999a. Der dritte Weg, *Die Zeit (11)*

(www.Zeit.de/tag/aktuell/199911.dritter_weg_.html).

, 1999b. Kampfansage an die alte Garde – Wie Gerhard Schröder und Tony Blair die Sozialdemokratie auf Vordermann bringen wollen, *Die Zeit (24)* (www.Zeit.de/tag/aktuell/199924.blair_schroeder_.html).

, 1999c. Zwischen Nacht und Tag – Vor dem Reformgipfel in Florenz: Europas Linke sucht eine gemeinsame Strategie, *Die Zeit (47)* (www.Zeit.de/tag/aktuell/199947.europa-linke_.html).

, 1999d. Schröder und Blair – Reformgipfel in Florenz : Ein feiner Unterschied, *Die Zeit (48)* (www.Zeit.de/tag/aktuell/199948.neue_mitte_.html).

- , 1999e. Die Neue Mitte ist anders, *Die Zeit* (49)
 (www.Zeit.de/tag/aktuell/199949.neue_mitte_.html) .
- Robertson, Roland, 1998. Glokalisierung : Homogenität und Heterogenität in Raum und Zeit, in Ulrich Beck (Beck) :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pp. 192-220.
- Rosenau, James, 1990.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Brighton.
- Scharpf, Fritz W., 1998. Demokratie in der transnationalen Politik, in Ulrich Beck (Hg.) :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pp. 228-253.
- Schmid, Klaus-Peter, 1999. Schrecken der Millionäre, *Die Zeit* (49)
 (www.Zeit.de/tag/aktuell/199949.reichen-steuer_.html) .
- Schmidt, Helmut, 1998. *Globalisierung – Politische, ökonomische und kulturelle Herausforderungen*, Stuttgart.
- Schmidt, Peter, 1996. Deutsche Sicherheitspolitik im Rahmen von EU, WEU und NATO, *Aussenpolitik* (47) : 211-222.
- Schwarz, Hans-Peter, 1994. *Die Zentralmacht Europas : Deutschlands Rückkehr auf die Weltbühne*, Berlin.
- Schwarz, Peter, 1999. Dritter Weg und Neue Mitte,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herausgegeben vom Internationalen Komitee der Vierten Internationale)
 (www.wsws.org/de/1999/jun1999/spd-j12.shtml) .
- Schwengel, Hermann, 1999. *Globalisierung mit europäischem Gesicht : Der Kampf um die politische Form der Zukunft*, Berlin.
- Spiegel Online*, 1998.12.01. Deutsch-französische Achse frisch poliert
 (www.spiegel.de/homepage/deutschland/gipfel2_in.html) .
- , 1999.03.11. Stimmen aus der Wirtschaft
 (www.spiegel.de/homepage/wirtschaft/lafowirtschaft4_wir.html) .
- , 1999.09.01.a. Linke schwenken auf Schröder-Kurs ein
 (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0,1518,39199,00.html) .
- , 1999.09.01.b. Rentenstrukturinflationchaos
 (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0,1518,39304,00.html) .

- , 1999.10.01. Lafontaine will die SPD nach links rücken
(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0,1518,44790,00.html) .
- , 1999.11.20.a Schröder fordert Übernahmerichtlinien
(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0,1518,53234,00.html)
- , 1999.11.20.b Schröder ist „fremdenfeindlich“
(www.spiegel.de/wirtschaft/politik/0,1518,53264,00.html)
- , 1999.12.03.a. Schröders Fünf-Punkte-Plan zur Steuerpolitik
(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0,1518,55329,00.html) .
- , 1999.12.03.b. Schröder bittet zur Kasse
(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0,1518,55086,00.html) .
- , 1999.12.03.c. „Es ist ein Mäuslein geboren worden“
(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0,1518,55252,00.html) .
- , 1999.12.03.d. Schröder versucht die Siegerpose
(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0,1518,55051,00.html) .
- , 1999.12.03.e. Duisenberg gibt Schröder die Schuld
(www.spiegel.de/wirtschaft/konjunktur/0,1518,55023,00.html) .
- , 2000.06.03. Plädoyer für Chancengleichheit
(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0,1518,79318,00.html)
- , 2000.06.04b, Die neuen Bosse
(www.spiegel.de/politik/europa/0,1518,79366,00.html)
- , 2000.06.04a, Die Leitlinien des modernen Regierens
(www.spiegel.de/politik/europa/0,1518,79369,00.html)
- Staud, Toralf, 1999. Rote Socken am Rhein, *Die Zeit* (49)
(www.Zeit.de/tag/aktuell/199949.pds_.html) .
- Stüwe, Klaus, 1999. Der Staatenbund als europäische Option : Förderative
Entwicklungsperspektiv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1-2/99, 8. Januar): 22-31.
- SZ (*Süddeutsche Zeitung*) on Net, 1999.09.27. Lafontaine rechnet mit Schröder ab
(www.sueddeutsche.de/politik/spd/hintergrund/spd_123456790.htm) .

- , 1999.12.04. SPD diskutiert weiter über soziale Gerechtigkeit
 (www.sueddeutsche.de/spezial.szml?ID=944287289&THEMA=spd&RESSORT=politi) .
-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2th 2000. Europe' s New Left. Pp. 19-23.
- Thurow, Lester, 1992. *Head to Head :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 Touraine, Alain, 1998. Links von der Mitte liegt die Zukunft, *Die Zeit* (46)
 (www.ZEIT.de/tag/aktuell/199846.tribuene_-_toura.html) .
- Voigt, Karsten, 1996. Das deutsche Interesse am Multilateralismus, *Aussenpolitik*
 (37): 107-116.
- Wagner, Wolfgang, 1999. Die Finanzverfassung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I-2, 8. Januar) : 32-38.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 , 1986. *Das moderne Weltsystem – Die Anfänge kapitalistischer Landwirtschaft und die europäische Weltökonomie im 16. Jahrhundert* (aus dem Amerikanischen von Angelika Schweikhart) , Frankfurt/M.
- Wende, Franke (ed.) , 1981. *Lexikon zur Geschichte der Parteien in Europa*, Stuttgart.
- Zürn, Michael, 1998. Schwarz-Rot-Grün-Braun : Reaktionsweisen auf Denationalisierung, in Ulrich Beck(Hg.):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pp. 297-330.